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4006

从期待到应答：《传习录》英译本接受美学解读

周杰，赵恋寒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以接受美学“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为理论框架，对比分析亨克与陈荣捷两位译者的《传习录》英译本，探究译者对读者期待的预设策略与对文本召唤结构的调控逻辑。研究发现：在期待视野维度，亨克针对西方普通读者“低儒学认知阈值”的期待，采用核心术语意译与通俗化注释等策略，弱化文本的文化与思辨壁垒；陈荣捷则针对汉学研究者“学术精准性与探究性”的期待，采用核心术语直译、文化背景增译等策略，赋予译本学术权威性。在召唤结构维度，亨克通过隐喻转化、思辨逻辑显性简化等方式弱化意义缺口，陈荣捷则以留白激发读者探究。

关键词：《传习录》英译本；接受美学；期待视野；召唤结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4-0042-08

《传习录》是阳明心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成于明代，系王阳明弟子徐爱、钱德洪等辑录其问答语录与讲学书信而成，共计 3 卷，涉及哲学、伦理、教育等多个领域。该书被誉为宋明理学转向心学的标志性儒家哲学著作，是阳明学派“教典”，其系统阐发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儒家心学思想，不仅深刻影响后世中国哲学发展[1-2]，更是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实现跨文化对话的关键文本。自 20 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传教士亨克[3]首次全文英译《传习录》以来，其英译实践已跨越百年。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该文本的历史语境、专门术语与工夫论话语结构共同抬高了英语世界的理解门槛：一方面，西方读者在心性论与儒家伦理上的知识储备存在缺陷；另一方面，语录体的碎片化与场景性又使其英译在“可读性”与“义理张力”之间面临取舍。如何让《传习录》的哲学思想突破文化边界，真正被西方读者理解与接纳，成为其英译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知，国内学界与国外学界对《传习录》英译本的研究侧重点明显不同：国内研究偏重译者与文本分析的传统范式翻译策略研究[4-8]，注重译本传播史梳理与影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 9-10]，关注译者身份的译者行为研究[2,11]；国外研究则呈书评驱动范式，主要侧重以译本评论为载体的哲学诠释研究[12-15]、跨文化传播史梳理[16]以及译者身份与动机研究[17-18]。整体而言，很少有学者引入接受美学这一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视角，系统考察翻译策略调整与读者接受反馈的动态关联。

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传习录》英译史上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译本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是 1916 年由西方汉学家亨克（Frederick G. Henke）完成的首部全译本，该译本以向西方普通读者普及阳明心学为目标，通过大量注释与文化类比降低理解门槛[3]；二是 1963 年华裔学者陈荣捷（Wing-tsit Chan）的学术译本，该译本以精准传递哲学内涵为核心，凭借严谨的术语体系与史料考据，成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传习录》的权威译本[19]。本研究将基于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通过案

收稿日期：2026-03-10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苗族贾理》英译及研究”（24GZZD48）

作者简介：周杰，女，四川乐山人，贵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料库、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译介、翻译史。

例分析，挖掘翻译策略背后的读者导向逻辑，进而探求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中“文化保真”和“读者接受”的平衡路径，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全球化传播提供理论参照与可借鉴的实践启示。

一、接受美学：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的互补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主张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流派。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意义并非由作者意图或文本结构单向决定，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经由读者的参与而得以实现[20-21]。学界通常将其思想脉络归为两个互补（即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的主轴，下文将具体阐述。

（一）期待视野：应答的认知前提

1967年，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就职演讲《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提出以读者的历史性接受来重写文学史，反对将文学史简化为对作家与作品的客观编年；在此框架下，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意义并不取决于作者创作意图，而是在不同时段读者群体的接受历程中动态生成，关注文本在不同“期待视野”中的阐释变异与意义延异[20, 22]。这一主张为跨文化文本研究中“读者认知差异对译本接受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姚斯的接受理论根植于阐释学传统，其核心概念之一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姚斯认为，即使是一部全新的作品，它也必定带有以往出现过的主题、形式、技巧与风格痕迹，而这些痕迹能激发读者对以往相似主题、形式、技巧与风格的记忆，从而主动参与阅读活动中，身临其境体验作品中的故事情节，由此产生阅读期待[20]23。也就是说，这些读者在阅读作品前就基于已有的审美经验（对文学主题、形式、风格等审美经验）和既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生活经验）构成了思维定向性期待（即“期待视野”），进而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纳程度。然而，需注意的是，期待视野并不是封闭独立、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因读者所处时代背景和各自文化传统等不同，又或是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阅读同一著作，其先在经验和知识结构均有差异或变化，期待视野也就各不相同。而不同的视野相互接触、对话、交汇，互相拓展与互相制约，这个过程就实现了“视野的融合”[23]113，即具备不同视野的人们经过交流对话等形式不断修正、扩展自己的期待视野，从而使得不同视野得以相融。“视野融合”生动揭示了个人与历史、当下与传统间的相互关联。

（二）召唤结构：“应答”的互动载体

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其《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提到，意义并非读者或文本单方面的产物，而是双方相互作用、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产生[24]，文本因语义留白、逻辑间隙与意象隐喻形成“召唤结构”，这种“意义缺口”并非文本缺陷，而是召唤读者主动介入、填补空白的核心载体[21]182, 220。

伊瑟尔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了文本与读者间的互动关系，“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继承于英伽登的图式化结构[23]115，指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中的语言是描述性语言，不同于其他科学文本的解释性语言；描述性语言具有更多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文本中各个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则导致了“文本的不确定性”，而正是这些“文本的不确定性信息”，主动“召唤”读者参与意义的创造性建构，促使读者在阅读时发挥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为文本结构中的不确定性赋予明确含义，用自己的先在经验填补其中的意义空白[21]182-184，即将不确定性信息具体化。这样，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空白”就构成了文学文本的基础结构，即“文本的召唤结构”。需注意的是，受文化、个人经验差异等影响，不同读者的具体化过程并不一致，所以具体化过程是由作品结果的稳定和读者的个人阅读行为共同作用而形成。

综上可见，姚斯的“期待视野”与伊瑟尔的“召唤结构”构成了接受美学的两大理论基石，前者确立了读者接受的历史维度，后者构建了文本与读者的交互维度，二者共同突破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封闭范式，开启了以“读者为核心”的文本阐释新路径。这一框架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革新，更成为《传习录》

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中译者策略与读者接受关系分析的重要理论工具，为揭示跨文化语境下文本意义的传递与变异提供了严谨的理论支撑。

二、从期待到应答：享克译本与陈荣捷译本的英译策略比较

《传习录》作为明代心学典籍，其文言文载体的凝练性、“心即理”“致良知”等哲思的思辨性，成为跨文化翻译的核心挑战。译者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预判精度、对“文本召唤结构”的调控尺度，直接决定译本的接受效果。亨克兼具传教士与哲学教授背景，曾在中国江西南昌传教数年，长期面向西方普通读者传播东方哲学，其对“读者低儒学认知阈值”的预设，催生了通俗化翻译策略；陈荣捷作为深耕宋明理学的美籍华裔汉学家，以西方汉学研究者为核心受众，其对“读者学术探究需求”的预判，主导了学术化翻译取向。二者的资质差异与策略选择，恰是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理论在典籍英译中的典型实践，下文将从两个维度展开具体分析。

（一）译者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预设与策略回应

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在阅读前基于自己以往的生活、学识、审美经验和个人文化背景等形成的一个预设框架，体现为一种隐性的审美期待。它并非静止封闭的，而是处于持续变化、拓展或重塑的过程中。《传习录》涵盖大量承载中国特有文化内涵的词汇，如人名、头衔与哲学术语等，这类文化负载词对西方读者而言实属陌生，因而目标读者在阅读该作英译本时，势必会产生不同的视野融合。

1. 核心术语的直译与意译：适配读者认知阈值

《传习录》蕴含诸多承载阳明心学文化意蕴的哲学术语，这类专有词汇在中西思想语境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是译者与读者视野融合的关键。针对这类核心术语，译者需预设目标读者的认知阈值与文化背景，在直译与意译间寻求平衡。前者有助于保留原术语文化内涵，后者则有助于降低读者理解门槛，使译文更契合读者的认知阈值与期待视野。译者的选择本质上是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预设与回应，其通过平衡文化保真与读者期待，实现双方有效视野融合。

例 1　原文：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25]34。

亨克译本：Last night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ord ‘thing’ of ‘investigating things’ is to be identified with the word ‘affair’. Both have reference to the mind[3]59.

陈译本：Last night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ord ‘thing’(wu) in the phras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ko-wu)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word ‘event’ (shih), both referring to the mind[19]14.

程朱理学中的“格物致知”强调探寻外在物理、事理、伦理与人内在本性之理，以完善道德知识，启发“良知”；而阳明心学秉持“格物”是内求自省，清除私欲以显“良知”[26-27]。在阳明心学中“物”即为“事”，指道德情境中的实践事件，而“格”是道德自省，祛除心中邪念。例 1 原文“格物”传递阳明心学内涵，承载作者期待视野。亨克采用意译，将“格物”“物”“事”分别译为“investigating things”“thing”和“affair”，沿用 1861 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中国经典》中“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的主流译法[26]，激活读者既有阅读经验、契合其期待视野，但该译法延续程朱理学解读，并未准确传递阳明心学“格物”内涵，且“affair”（指私人或日常事务）难以体现“事”的道德实践内涵；加之当时西方学者对阳明心学了解甚微，且受 19 世纪新教传教士译本影响，倾向于将东方思想视为“陌生文化”，需使用通俗词汇降低理解门槛，故亨克译法虽贴合读者期待，却弱化了文化内涵，未能同原作者视野相融。

陈荣捷则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将“格物”“物”“事”分别译为“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ko-wu)”“thing (wu)”和“event (shih)”。不同于亨克译本，陈荣捷译本对术语进行音译处理，拓展并重塑了读者期待视野。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子对阳明学研究兴致高昂，具备哲学术语辨识能力与儒家知识基础，能够接受抽象、术语化表达。陈荣捷通过音译标注这些词汇为特定哲学概念，强化了其

文化内涵。将“事”译为“event”，该词可指具时间性、情境性与实践性的伦理事件，契合原文中“事”的内涵。陈译本对术语进行音译 + 意译处理，明确告诉读者“格物”“物”“事”是特定哲学概念，提升了学术性与文化保真度，实现了原作者视野与读者期待视野的有效融合。

例 2　原文：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25]26。

亨克译本：When the mind is free from the obscuration of selfish aims,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add one whit from without[3]51.

陈译本：When the mind is free from the obscuration of selfish desires,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which requires not an iota added from the outside[19]7.

例 2 中的“天理”一词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既包含宇宙本源的终极性，也蕴含道德伦理的准则，是涵盖哲思的术语。亨克采用意译，将“天理”一词译为“the principle of heaven”。受自身基督教文化影响，亨克将带有超验、神圣色彩的“heaven”即“天堂”对应“天理”中的“天”。“heaven”一词呼应了西方宗教传统中“上帝”所代表的终极秩序，契合译文读者既往阅读经验，符合译文读者对“神圣原则”的期待视野。亨克的译法将天理的“终极性”与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神圣性”相融合，便于读者快速理解“天理”所蕴含的至高无上且不可违背的神圣法则，但却削弱了“天理”的实质性内涵。

陈荣捷则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将“天理”一词译为“the principle of nature”。“nature”一词连接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和西方近代的“自然法则”思想，更强调自然、客观规律。尽管“nature”并非“天”的字面翻译，但仍能从“自然法则”角度诠释“天”，是语义层面的合理转化。基于彼时西方读者对先秦典籍《道德经》有一定研究，陈荣捷预设当时西方读者对东方哲学中的“自然之道”已有一定了解，契合读者对“客观法则”的期待视野，这种融合更易让读者理解“天理”作为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但同时也可能弱化“天理”的超验性，将其呈现为一种更接近“自然规律”而非“神圣本体”的概念。

2. 文化补白的注释与解释：降低读者理解门槛

《传习录》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包含大量文化典故与历史语境，其中的文化负载词常超出西方读者认知经验，造成理解困难。译者英译时不仅要转换语言，更要关注文化阐释与意义衔接的问题。为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化负载词，译者常以注释和解释性翻译进行文化补白，使译文在忠实传达原作内涵的同时，降低读者的理解门槛。此类策略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原作思想语境，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其期待视野，实现跨文化意义的有效传递。

例 3　原文：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25]41。

亨克译本：From the time when Fu Hsi drew the eight diagrams① up to the time of Wen Wang and Chou Kung, portio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such as Lienshan and Kueits’ang…[3]63.

① The eight diagrams consist of eight combinations of a line and a divided line. They are said to have been copied from the back of a tortoise by the legendary monarch Fu Hsi. They were used in philosophizing and in speculating about nature.

陈译本：From the time of Fu-hsi [legendary emperor of great antiquity] who devised the Eight Trigrams to the time of King Wen [1171—1122 B.C.] and Duke Chou [d. 1094 B.C.], a countless number of books such as the Lien-shan (Mountain range) and the Kuei-ts’ang (Reservoir) was written on the doctrine of Changes…[19]18.

例 3 中，两位译者对人名和头衔的翻译各有差异。文王、周公是周朝开国建制的关键人物，伏羲则是中国上古神话核心、汉族古帝，三者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地位显著，但其头衔与身份对西方读者较陌生。两译者均使用 20 世纪英语世界通用的威妥玛氏拼音，契合当时读者接受习惯与期待视野。亨克采用直译法，仅将姬昌、姬旦的头衔与伏羲分别音译为“Wen Wang”“Chou Kung”“Fu Hsi”，未增补文化历史信息，而彼时西方读者对除先秦儒道典籍《论语》《道德经》等外，极少接触其他中国哲学典籍，易因

缺乏相关知识而难以把握人物的重要性；陈荣捷则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使用音译与增译技巧将其分别译为“King Wen [1171—1122 B.C.]”“Duke Chou [d.1094 B.C.]”“Fu-hsi [legendary emperor of great antiquity]”，用西方爵位头衔“king”“duke”等词对应文王、周公爵位，补充其生卒年和伏羲的上古传说帝王身份“legendary emperor of great antiquity”。此举降低了读者的文化理解门槛，激活了读者的固有认知，拓展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有助于他们将陌生的中国历史人物纳入自身认知体系中。

另外，两位译者对“画卦”的翻译也有差异。“画卦”源自伏羲创八卦的上古传说，八卦是对宇宙万物规律的概括，可解释自然、社会现象及预测事物发展。亨克采用直译结合注释增译的方法，将“画卦”译为“drew the eight diagrams”，以“drew”对应“画”、“diagrams”（图表）对应“卦”，用日常化用语降低理解难度，同时通过脚注补充“卦”的文化涵义。亨克预设彼时读者对中国哲学思想了解尚少，主动适配读者对陌生文化信息的理解需求，助力读者借助辅助信息把握“画卦”核心概念，但也因此弱化了“卦”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印证了日本学者姉崎正治（Masaharu Anesaki）“亨克译本中的大部分专业术语过于通俗”的评价[12]596。而陈荣捷则采用意译，将“画卦”译为“devised the Eight Trigrams”。其将“画”意译为“devised”，意为“创造、设计”，既包含“画”的动作，又凸显伏羲的创造性思维，契合八卦的文明创造内涵；将“卦”译为“trigram”，该词是汉学领域标准学术术语，适配彼时西方读者因阳明学研究热而具备一定文化基础[1]的期待视野，既保持译文简洁专业，又完整保留文化内涵。综上，亨克译本侧重以通俗化与补充说明来减少文化隔阂；陈译本则以读者文化基础为前提，力求通过精准专业表达，保留文化内涵的完整性。

（二）译者对文本召唤结构的调控与意义共建

文本“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核心概念之一，文本因语义留白、逻辑间隙与意象隐喻形成“召唤结构”，需读者主动参与解读以填补空白、完善意义。这种结构并非固定，译者作为源语文本的读者与目标语文本的作者，会基于目标语读者认知判断进行主动调控，而译者处理这些不确定性信息的方式，将直接决定意义的生成路径与接受效果。《传习录》作为富含哲学隐喻与概念张力的中国哲学典籍，其英译必然要对文本中的“召唤结构”进行调控，以助力目标语读者理解其中的不确定性信息。因此，针对认知层次、时代背景不同的目标语读者，译者调控“召唤结构”的方式也会不同。

1. 隐喻表述的逻辑显性化：缩小读者解读缺口

《传习录》中有大量隐喻表述，承载着一定的深层哲思与文化内涵。隐喻作为复杂语言手段，既在语言表层传递意义，又能借形象化表达帮助读者理解抽象概念，但其隐晦性常让读者解读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为缩小这一解读缺口，兼具原作读者与译本作者双重身份的译者，处理隐喻时需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将其逻辑显性化，在保留文本思想内核的同时贴合目标语读者期待视野，助力其顺利参与文本意义构建。

例 4　原文：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25]87

亨克译本：Yueh-jen said: “The mind may be compared to a mirror. The mind of the sage is like a bright mirror, the mind of the ordinary man like a dull mirror. The saying of more recent natural philosophy may be compared to using it as a mirror to reflect things. If effort is expended in causing the mirror to reflect while the glass is still dull, how can one succeed?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the Teacher is like a polished and brightened mirror. When after having been polished the mirror is bright, the power of reflecting has not been lost.”[3]93

陈译本：Hsu Ai said: “The mind is like a mirror. The sage’s mind is like a clear mirror, whereas that of the ordinary person is like a dull mirror. The theory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in recent times② says that it works like a mirror reflecting things and the effort is to be directed toward the [passive] role of reflecting. They don’t realize that the mirror is still dull. How can it reflec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in our Teacher’s theory is like

polishing the mirror to make it clear. The effort is to be directed toward the [active] role of polishing. When the mirror is clear, it does not cease to reflect③.”[19]45

② In the Chu Hsi school.

③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is is the only independent saying by a disciple of Wang’s in the whole book.

例 4 中的“心犹镜也”是一类典型的哲学隐喻，以“镜”的具象阐释“心”的抽象涵义。该隐喻存在两处核心不确定性：一是“镜”的指向不确定，既可指“心之本体”的明暗状态，又可指“心的功能”之映照作用；二是“以镜照物”（程朱格物）与“磨镜使之明”（阳明格物）的对立，隐含“镜”在其功能上或本体上用功的逻辑冲突，形成语义空白与逻辑间隙。这种文本不确定性构成“召唤结构”，激发读者主动构建意义。两位译者英译时均对该结构进行了调控，将抽象隐喻显性化、逻辑化，以缩小读者解读缺口。

亨克译本面向 20 世纪初西方阳明学入门者，采用直译和意译浅层填补隐喻信息：以“bright/dull”（明亮 / 昏暗）对立直译“明镜 / 昏镜”，锚定“镜”的本体指向，填补语义空白；将“照上用功”意译为“effort in causing the mirror to reflect”、“磨上用功”意译为“after being polished the mirror is bright”，借动作对比显化格物逻辑差异。但他把“磨镜”简化为“polished and brightened”，仅体现“镜变亮”的结果，丢失“修心去蔽”的阳明心学哲学内涵。这种“去繁就简”虽可填补原文逻辑空白，契合目标语入门者“低负担理解”需求，却印证了姊崎正治（Anesaki）“亨克译本中术语翻译贴合朱熹而非王阳明的心学内涵”[12]596 之评价。

陈荣捷译本面向西方汉学研究者，以直译与增译降低不确定性：用“clear mirror”（澄明之镜）直译“明镜”，更贴合“心之本体澄明”内涵，增译“whereas”强化“明与昏”的逻辑对立。他将“磨镜”译为“polishing the mirror to make it clear”，显化“镜的本体状态可通过‘磨’改变”的语义。此外，他在翻译“照上用功”和“磨上用功”时增译“[passive role]”和“[active role]”，彻底显性化“照物”与“磨镜”的逻辑对立，助力读者理解程朱与阳明格物差异，精准填补原文逻辑空白；通过增添脚注明确“近世格物之说”对应“程朱学派”（in the Chu His School），消除学派指向的模糊性。哥伦比亚大学谢康伦（Conrad M. Schirokauer）曾评价陈译本“忠实于原文文本，且通过严谨的术语译法与丰富注释辅助理解”[14]152，其对隐喻信息的显化处理正是对此评价的直接佐证，精准保留了原文哲思。陈荣捷通过隐喻语义和逻辑显性化等方式，既保留原文哲思深度，又满足目标语读者对哲学精确性与文化深度的需求。综上，两位译者均通过调控召唤结构缩小解读缺口，而陈译本在保留原文哲思与文化内涵上更具优势。

2. 模糊语言的确定性转化：平衡读者探究空间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核心术语的模糊性会构成文本中的“召唤结构”，译者需结合目标语读者定位，将不确定性信息具体化，准确传递原作意义，以推动原作者和译者的视野相融，平衡读者的探究空间。

例 5　原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5]30。

亨克译本：Knowledge is the purpose to act, and that practice implies carrying out knowledge. 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 of practice; doing is the completion of knowing[3]55.

陈译本：Knowledge is the direction for action and action the effort of knowledge, and that 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 of action and action the completion of knowledge[19]11.

例 5 中的“行”是阳明心学中与“知”辩证统一的核心概念，涵盖“行动、实践、过程、结果”多层内涵，其模糊性构成文本“召唤结构”，吸引读者主动参与建构。两位译者对该词的翻译处理各异。亨克将“行”意译为“act/practice/doing”，通过多样化译词将抽象概念具体化，降低陌生感，以满足西方阳明心学入门读者“低负担理解”需求，契合哈佛大学神学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对该译本“可读性极高”[13]116 的评价，但拆解了“行”的概念整体性，易导致读者形成片面认知。陈荣捷则将“行”统一直译为“action”，遵循其在“译者注”所提出的“术语翻译一致性”原则[19]xiv，保留概念统一性，避免因拆解而丢失“行”

的哲学辩证含义，既保留原文的“召唤结构”，又引导具备一定阳明学知识的专业读者自主探究，匹配其对哲学精确性的需求。通过读者与译文不断交流与对话，最终形成作者－译者－读者视野相融。综上可知，两位译者都尽力贴合译本读者的期待视野。笔者认为，相较于亨克译本，陈译本的视野融合效果更好。

本研究以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为核心分析工具，聚焦亨克译本与陈荣捷译本两部《传习录》英译本，系统探究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策略与接受逻辑。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译本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预设回应与对“文本召唤结构”的调控方式，揭示了《传习录》英译中策略选择、读者定位、接受效果的内在关联：亨克基于西方普通读者“低儒学认知阈值”的期待，以核心术语意译、通俗化注释、隐喻逻辑显性简化等策略，降低文本的文化与思辨壁垒，其译本成为 20 世纪初阳明学民间传播的入门载体；陈荣捷则针对汉学研究者“学术精准性与探究性”的期待，采用核心术语直译、文化背景增译、保留思辨留白等策略，赋予译本学术权威性，其译本成为西方阳明学研究的核心文献。二者的策略分野与接受差异，本质是译者对“读者期待”的精准预判与对“文本召唤结构”的适度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印证了接受美学理论在典籍英译研究中的适配性与解释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研究对象仅聚焦两部代表性译本，未涵盖 20 世纪 80 年代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选译本等材料；对接受效果的分析未结合读者访谈、评论数据等实证材料展开深度验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展译本范围，纳入多元传播语境下的新译本；同时引入实证研究方法，结合 Goodreads 等平台的读者评论、学术数据库的引文分析等，量化考察不同译本的接受效果。

参考文献：

[1] 费周瑛，辛红娟 .《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J]. 浙江社会科学，2019(5)：121−127.

[2] 赵秋荣，孙培真 . 译者多重身份对译者行为影响路径的语料库考察：以《传习录》英译本为例 [J]. 外国语文，2024，40(1)：131−143.

[3] Henke F G.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M]. London and Chicago：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16.

[4] 费周瑛 . 翻译转喻视角下陈荣捷英译《传习录》策略研究 [D]. 宁波：宁波大学，2019.

[5] 刘响慧 . 典籍英译中的语用充实：以陈荣捷《传习录》（上）英译本为例 [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8(2)：116−121.

[6] 辛红娟，费周瑛 . 陈荣捷《传习录》英译的转喻视角研究 [J]. 国际汉学 , 2019(2)：160−168，126，206−207.

[7] 徐赛颖 . “厚重翻译”观照下的亨克英译《传习录》探析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0(3)：231−240.

[8] 张帆，刘华文 .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译释层次分析：以《传习录》英译文本为例 [J]. 外语研究，2024(2)：94−99.

[9] 刘孔喜，胡琴 . 作为教育行为的《传习录》英译与传播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30(3)：89−93.

[10] 刘孔喜 , 许明武 .《传习录》英译史与阳明学西传 [J]. 中国翻译，2018(4)：28−35.

[11] 刘孔喜 . 离散译者陈荣捷与《传习录》英译 [J]. 中国翻译，2019(6)：52−60，191.

[12] Anesaki M. Book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1918，22(4)：594−600.

[13] Moore G F. Book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J]. The Harvard Rheological Review，1919，12(1)：116−118.

[14] Schirokauer C M. Book review: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by Wingtsit Chan[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24(1)：151−152.

[15] Shih V Y C. Book review: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65，15(3/4)：293−296.

[16] 伊来瑞 . 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 [J]. 阳明学刊，2015(00)：198−211.

[17] Chan W T. Wang Yang-ming: Western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72，22(1)：75−92.

[18] Ching J. 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M]. Canberra：Austri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2.

[19] Chan W T.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M].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20] Jauss H R.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M]. Bahti T，Translated.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21]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 Jauss H R，Benzinger E.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J]. New Literary History，1970，2(1)：7−37.
[23] 任卫东 . 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 [J]. 外国文学，2022(4).
[24] Iser W. Indeterminacy and the reader's response in prose fiction[M]//Miller J H. Aspects of narrativ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1−45.
[25] 王阳明 .《传习录》[M]. 于自力，注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6] 陈琦 . 从自然理性到文明教化：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之说英译史考辨 [J]. 外国语，2024，47(5)：82−93.
[27] 郭清香 . 道德知识何以可能：以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说为基础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38(5)：161−170.

From Expectation to Response: A Reception Aesthetics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uanxilu*

ZHOU Jie, ZHAO Lianh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calling structure” from reception aesthetic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uanxilu* by Henke and Chan Wing-tsit to explore the translators' preset strategies for readers' expectations and the regulatory logic for the text's calling structur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erms of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Henke uses strategies such as free translation of key terms and accessible annotations to cater to the expectations of general Western readers with a low threshold of limited Confucian knowledge, thereby weakening the cultural and speculative barriers of the text. Chan, by contrast—targeting Sinology researchers with expectations of academic precision and inquiry—adopts strategies including literal translation of key terms and supplementary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confer academic authority upon his translation. Regarding the calling structure, Henke weakens meaning gaps via metaphor transformation and explicit simplification of speculative logic, while Chan retains blanks to stimulate reader exploration.

Keywords：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uanxilu*; reception aesthetic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calling structure

责任编辑：徐海燕